

# 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

## ——基于32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鲁 桑<sup>1</sup>, 庄晋财<sup>2</sup>

(1.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2. 江苏大学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为对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及实现高赋能成效的路径进行探究,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凝练出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 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 探究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实现高赋能成效的不同条件组态。结果表明, 技术维度、个体维度与环境维度下存在数字化的便捷程度、可应用的场景、创业者素质、创业者风险偏好、政策性支持、金融信息平台建设6个影响赋能成效的因素。在6个因素的不同组合下, 形成了3条取得高赋能成效的路径, 即全面均衡型、环境拉动型、个体能动+环境拉动型路径。

**关键词:** 数字金融; 乡村创业; 扎根理论; 影响因素; 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22)3-0071-10

##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创业正不断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乡村创业不仅关系着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 还能够有效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庄晋财等, 2019)。高回报的创业活动也伴随着高风险, 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失衡、创业者自身素质不高等因素的制约下, 出现了创业要素获取成本高、创业者抵制风险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 导致乡村创业失败率较高(郑雁玲和田宇, 2021)。因此, 要创新乡村创业的支持模式, 利用新方式对创业活动进行有效赋能。

伴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传统行业, 各产业间边界变得模糊, 产业间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以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赋予“新权力”的崛起, 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学者们开始将数字技术与赋能联系起来展开研究(Majchrzak et al, 2007)。在创业研究中, 数字技术给创业活动带来了颠覆式的变化。其中, 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模式的结合成为数字赋能创业活动最具典型性的代表(宋帅和李梦, 2021)。我国“三农”的发展, 长期以来都受到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制约, 对于创业而言, 在传统金融体系运营模式的成本约束下, 传统金融机构很难为高风险的创业活动提供物美价廉的金融服务(温涛和陈一明, 2020)。而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模式结合下的数字金融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 降低信息收集和交易成本, 同时增加创业者接受金融服务的积极性, 为乡村创业赋能(李德山等, 2021)。但现实中, 在对数字金融支持下的乡村创业进行考察时, 发现其赋能效果并不明显, 主要体现在创业者对数字金融的利用率不高, 积极性不强, 参与度较差等方面, 数字金融对创业活动影响并不显著(张龙耀等, 2021; 国胜铁和姚育成, 2021)。那么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基于此, 本文首先对18位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分析, 并对访谈记录及收集的资料进行梳理, 通过扎根理论编码探索, 分析数字金融有效赋能乡村创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以期对上述的矛盾提供有力解释。在此基础上, 通过调研得到的32个相关案例, 探索性地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法从整体性研究视角出发, 探究影响赋能效果的可能性因素组合, 找出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的最佳路径。

## 二、文献回顾

### (一) 乡村创业的金融困境

资金作为创业的必要投入要素, 在乡村创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大量研究也表明资金是我国乡

收稿日期: 2021-10-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城乡要素共生视角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19BGL149)

作者简介: 鲁桑,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乡村创业; 庄晋财, 博士, 江苏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研究方向: 乡村创业与区域农村发展。

村创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何广文和刘甜,2019)。尽管依托血缘、亲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网络能够满足乡村创业者的部分融资需求,但依靠非正规金融获得的资金可持续性较差,难以充分支持对固定或半固定资产的投资(苏岚岚等,2021;苏皓等,2021)。因此,正规金融支持就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创业的重要引擎。但是,金融支持乡村创业却面临多重困境。首先,在城市和农村中存在过剩与短缺并存的资金错配现象(田杰等,2021)。农村地区并非没有资金,而是金融机构以极低成本抽取了农村地区存款,投资于城市高回报率的行业,在金融排斥下农村地区出现了存大于贷的现象(兰永海和温铁军,2018)。其次,创业者缺乏抵押物难以获得大额金融支持。农村资源大多是非标的,不可作为抵押品获得外部资源支持,而金融机构也需要执行相关金融法规,控制风险敞口,这导致乡村创业缺乏金融支持(张林和温涛,2021)。最后,现有金融服务供给难以与乡村创业者需求匹配。信息不对称下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金融机构往往无法兼顾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制约者金融机构向乡村创业者提供充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Stiglitz和Weiss,1981)。

## (二)数字金融与乡村创业

数字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融资、支付、投资的其他新型金融服务,其本质上并未脱离传统金融业,是利用数字技术的特性,通过融合的方式对其他生产要素进行赋能和增效。因此其成为金融行业的新领域(黄益平和黄卓,2018;蔡莉等,2019)。数字金融的出现能够有效缓解创业者的资金约束,提供便捷安全的资金服务,深化对创业者的金融支持。但乡村创业在空间、主体及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决定了需要对数字金融赋能的现实和理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在理论上,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金融模式,由于数字金融的开放性、传播性、共享性特征,创业者获得资金的渠道变宽,效率变快,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改善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的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推动长尾效应实现(陈晓芬和杨朝军,2017)。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等特征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率,实现创业机会均等化,壮大农村经济发展(黄季焜,2018)。在实践中,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的“三农”金融服务模式、大数据和现代化信息技术赋能下的农业保险决策管理模式证明,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模式结合的可行性,为理论研究提供现实支撑(高锡荣和王兴蓉,2020)。

## (三)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的影响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数字金融能从多方面影响乡村创业,但其赋能效果受到不同因素影响。因此数字金融赋能效果并非同质(曾之明等,2018)。首先,赋能的前提要建立在乡村创业者使用数字金融的基础上,而依托数字技术的线上交易存在一定风险,创业者对风险的规避态度决定他们对网络交易的使用频率(苏岚岚等,2021)。因此,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便捷程度则能够影响创业者体验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意愿,而创业者使用意愿的改变将直接决定了乡村创业中数字金融的使用。其次,数字金融的使用离不开人,创业者的数字素养成为数字金融嵌入创业活动的关键环节(苏岚岚和彭艳玲,2021)。乡村创业者数字素养,将决定其能否熟练掌握并操作不断迭代升级的数字金融产品,进而影响了数字金融对创业活动的赋能效果(常凌翀,2021;温涛和何茜,2020)。最后,数字金融作用的发挥依赖于政策的保障与支持,一方面相关政策文件能够影响金融机构开发新的数字金融产品的积极性与向小微创业活动提供服务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政策上的财政支持能够有效对数字金融的开发和供给成本产生影响(何广文和刘甜,2019)。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前研究聚焦于赋能技术本身、赋能主体及赋能的政策环境三个方面对赋能成效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仅研究了乡村创业的金融困境,还分析了数字金融与乡村创业间的关系,提出影响数字金融赋能成效的影响因素,但是影响赋能成效的因素并非单一,当前学者却鲜有研究多个影响因素与赋能效果间的多重并发关系,不同影响因素的组合效应对赋能成效的影响尚不明确。因此,从整体性研究的视角出发,在组态基础上揭示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的高赋能路径对更好促进乡村创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的杰出代表,它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现象进行聚焦分析,在对文献和多渠道资料深度解剖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系统的逻辑、归纳、演绎、对比和分析,逐级提升概念及其关系的抽象层次,并通过概念之间的联系自下而上构建实质理论,解释社会现象(Strauss和Corbin,1994;Strauss和Corbin,

2015)。在当前乡村创业中,数字金融赋能成效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未产生成熟的理论,通过综述的方法不能全面、有效的囊括可能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选取访谈扎根的方法,针对访谈材料中影响赋能成效的因素进行编码,提取出定性比较分析法中的条件变量。

定性比较分析(QCA)法是一种将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的方法,相较于传统定量方法,QCA通过考察前因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充分与必要关系,弥补定量分析中忽视变量共线性问题的不足,解释了自变量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林虹等,2021)。具体到本文中,数字金融赋能成效并非受单一因素影响,其对乡村创业的赋能成效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中国乡村创业的实践,在创造性地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基础上,能够更为清晰地探究出有效赋能的路径,本研究方法如图1所示。

## (二)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扎根理论提取出QCA方法所需的条件变量。因此需要尽可能地获取反映赋能成效影响因素的第一手资料。首先,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的赋能并非受单一因素影响,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影响了最终的赋能成效。其次,仅凭已有文献不足以充分概括影响赋能成效的因素。最后,要提取全面的条件变量,仅靠对单一主体访谈难以完全消除访谈对象固有的刻板印象,不利于形成客观、严谨的结论。基于此,本文选取来自金融机构、创业者个体、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为访谈对象。选取这些研究对象具有以下优势:①典型性。数字金融赋能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包括金融机构、乡村创业者及政府部门这三方,能够为分析赋能成效的影响因素提供丰富素材;②便捷性。团队长期在村镇一级开展调研,频繁接触这三方主体,通过访谈、政府及金融部门提供的数据可以获得大量素材,为QCA条件变量的提取提供有力保障。因此,本文根据问题设计访谈提纲,对相关主体进行访谈并做好记录。考虑到数字金融在全国各区域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而数字金融的有效供给是开展研究的前提,访谈选取的人员来自数字金融发展较好的苏南地区,访问了涵盖三类主体在内的18人,详细收集过程见表1。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将在苏南地区数十个乡镇收集的32个乡村创业案例作为对象,开展定性比较分析。

表1 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访谈记录

| 时间         | 地点     | 人物                         | 事件及内容                                                 |
|------------|--------|----------------------------|-------------------------------------------------------|
| 2021年5月19日 | 扬中市新坝镇 | 银行及保险负责人2名、政府部门人员2名、经营主体2名 | 听取新坝镇数字金融业务开展的水平,政府的支持力度及创业者对于当前数字金融使用情况的看法,持续2.5小时   |
| 2021年5月26日 | 丹阳市珥陵镇 | 银行及保险负责人2名、政府部门人员2名、经营主体2名 | 针对当前数字金融开展的现状、困难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度访谈,并私下交流访问,持续时常3小时       |
| 2021年6月10日 | 句容市天王镇 | 银行及保险负责人2名、政府部门人员2名、经营主体2名 | 通过银行及保险部门介绍的业务种类、政府在数字环境的建设、创业者的金融需求出发,获取关键信息,持续2.5小时 |

## 四、基于扎根理论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访谈资料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需要对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提取其中的相关概念(王丹和李柏洲,2021)。这一阶段主要以转录稿原文为主,其他途径获取的资料为辅,同时注意避免个人主观意愿干扰。本文对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的开放式编码借鉴已有研究,具体过程如下:①对转录的内容进行总结,凝练出能反映对赋能成效产生影响的原始文本语句;②从凝练的语句的基础上,提炼出初始概念;③再对初始概念进一步提炼得出初始范畴。根据以上步骤,把18位被访问者的原话转录内容作为标签获得初始概念(其中case 1~case 5为对创业者的访谈内容,case 6~case 10为对金融机构的访谈内容,case 11~case 15为对政府人员的访谈内容,并选取剩余3段访谈记录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在此基础上精炼定义出初始范畴,最终获得描述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影响因素的30个范畴,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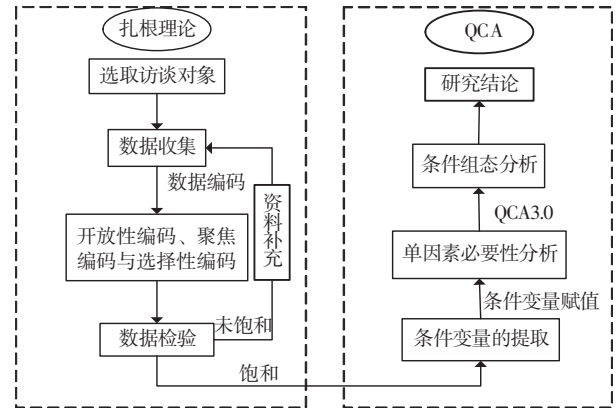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研究方法



表 2 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开放式编码

| 访谈编号    | 记录摘抄                                             | 初始概念                     | 初始范畴           |
|---------|--------------------------------------------------|--------------------------|----------------|
| case 1  | 种养殖业的收益周期较长,成果显现较慢,而还款周期却不长                      | 金融产品的灵活性不够,难以适用于不同创业情景   | 数字金融产品创新程度     |
|         | 我们被授信过后,一般只能获得 5 万~10 万元的贷款,对真正创业活动起不到太大作用       | 授信后的贷款额度对于创业无法真正起到助力作用   | 创业可获的贷款额度      |
| case 2  | 农机等抵押物难以得到银行认可,而现在线上信用担保贷款过程太烦琐,很多老年人不会用         | 创业者不懂网络技术约束了赋能效果         | 创业者数字能力高低      |
|         | 在村子里,缺少可以运行的合作社,个体线上贷款的额度很小,村委会又不能作为贷款主体         | 大额贷款缺少承贷主体,个体贷款额度小       | 大额贷款涵盖的主体      |
| case 3  | 每个镇产业发展情况,甚至每个创业者情况都不一样,我们更需要不同种类的线上金融产品         | 创业者需要数字金融产品多元化,满足个性化需求   | 主体金融需求的多样化     |
|         | 线上贷款过程要简洁高效,突发情况发生时能很快获得贷款,希望网上银行要更加便捷高效         | 贷款需求出现时,能够通过数字金融产品迅速满足需求 | 金融需求得到满足的效率    |
| case 4  | 农村创业特别容易受天气影响,贷款扩大规模后如果赔了怎么办,怕经营出问题还不上贷款         | 对创业扩张采取规避态度,不敢利用金融杠杆扩大规模 | 投资的谨慎程度        |
|         | 像我们年纪大的人,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申请流程不会,需要工作人员指导               | 中老年人接受新技术能力弱,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 软件 and 硬件的支持水平 |
| case 5  | 他们来家里授信,我们不懂这些产品,缺乏理解,就怕骗子,怕在网上就把钱给骗走了           | 中老年人比较怕承担风险,怕被网络诈骗       | 风险规避的态度        |
|         | 希望银行对我们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一些要素类的线上金融产品,如山东工行的产业贷            | 贷款供给产品不足,难于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 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    |
| case 6  | 我们给个体客户 10 万元额度,核定后额度基本不变,信用担保利率 6.09%,大额贷款需线下办理 | 授信额度小,不易变更,利率高,难以满足创业需求  | 政府财政补贴         |
|         | 银行间因竞争缺乏信息共享,收集用户信息时会耗费很大成本,希望数据方面得到政府支持         | 创业信息获取不完整,缺乏共享机制,信息收集成本高 | 信息的不对称程度       |
| case 7  | 用村里喇叭宣传金融政策,当前我们镇授信用户才达 127 户,总行目标是 6 月末达 350 户  | 金融产品、服务宣传方式较为传统,且效率不高    | 数字金融的宣传方式      |
|         | 授信等级根据村干部对个人了解程度,但现在很多人在外打工后返乡,干部对他们并不了解         | 授信等级的评定方式存在缺陷,无法实现供需对应   | 授信方式的完善        |
| case 8  | 对于授信签约,村民普遍不积极,没有太强欲望,签约提供资金少,通过亲戚朋友可以获得         | 信用担保贷款额度小,村民同时趋向于规避风险    | 贷款积极性          |
|         | 在收集个人征信数据过程中,我们不能调研到一些类似赌博、不良记录的信息               | 用户信息获取渠道窄,获取内容不全面        | 信息获取成本         |
| case 9  | 我们银行更多通过对创业行业前景,发展方向考察,决定线上贷款数额,充分进行风险控制         | 银行授信过程中,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 授信额度的依据        |
|         | 如果贷款人的信息能应用数字化技术,一输入就查出来,就可以直接线上授信,会提升效率         | 在授信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加持能够提升工作效率   | 数字技术应用程度       |
| case 10 | 当前只涉及作物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关于农产品加工的险种目前还没有                 | 农业保险险种较少,难以覆盖农产品全产业链     | 农业保险覆盖面        |
|         | 对于保险产品,我们现在有大风摧毁大棚的保险,但理赔不涉及里边的作物                | 农业保险覆盖面窄,难以规避部分经济作物种植的风险 | 农业险种的种类        |
| case 11 | 对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数字乡村方面,我们想做但是缺乏资金                  | 地方政府缺乏资金投入,难以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 财政支持力度         |
|         | 金融部门加大融资力度,线上贷款利息降低,为创业者减少成本,这样才能真正助力创业          | 数字金融产品的普惠性程度不够,赋能的成本较高   | 产品宣传效果         |
| case 12 | 我了解的是,尽管采取整村授信,但是当前力度还是不够,授信方式效率太低               | 当前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不够,普及率不高      | 授信方式效率         |
|         | 我们政府的涉农贷会有补贴,但并不是每年都有,因为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动                | 政策支持会发生变动,金融产品成本难以迅速下降   | 政府贴息力度         |
| case 13 | 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在政策限制下地方政府更多依靠上级财政,难以通过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 地方政府获取资金途径有限,难以持续优化赋能环境  | 政府资金获取渠道       |
|         | 我们知道银行有很多的涉农贷产品,但创业者并无关注,加强宣传是我们政府下一步要做的         | 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协调度不够,难以形成多方合力  | 部门间协调度不够       |
| case 14 | 金融环境优化需要资金,村委会无法向金融机构贷款,各村镇数字乡村建设多依靠财政支持         | 金融环境的持续优化,需要上级政府的资金投入    | 赋能环境优化的政策支持    |
|         | 我们镇进行创业的多是从从事养殖的外地人,金融机构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对其授信            | 信用信息不全面,授信成本过高           | 授信成本问题         |
| case 15 | 多数创业者缺乏金融知识,需要钱不知道从哪里获取,需要金融知识和政府的引导             | 创业者自身文化素养不高,金融知识储备不够     | 创业者金融知识的普及     |
|         | 地方农村妇女比较保守,一般都反对丈夫贷款开展创业活动,怕家里背负债务,无法偿还          | 家庭因素影响,惧怕风险,尽可能避免贷款      | 家庭对风险的规避       |

## (二)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初始范畴基础上,根据“条件-行为-结果”的范式,辅以必要资料挖掘,对不同范畴进行归纳,构建出各个范畴间的联系,进一步凝练成“主范畴”(雍旻等,2021)。基于上述的30个初始范畴,通过对文本材料进行情景化的整合,形成6个主范畴,上述主范畴和初始范畴间的关系内涵见表3。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 对应的主体/产品 | 主范畴      | 初始范畴                                                       |
|----------|----------|------------------------------------------------------------|
| 数字金融产品   | 数字化的便捷程度 | 数字金融产品创新程度、数字金融的宣传方式、数字技术应用程度、金融需求得到满足的效率、授信方式效率、产品宣传效果    |
|          | 可应用的场景   | 创业可获的贷款额度、大额贷款涵盖的主体、主体金融需求的多样化、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农业险种的种类、农业保险覆盖面 |
| 创业者      | 创业者素质    | 创业者数字能力高低、创业者金融知识的普及                                       |
|          | 创业者风险偏好  | 投资的谨慎程度、风险规避的态度、贷款积极性、家庭对风险规避                              |
| 政府部门     | 政策性支持    | 政府财政补贴、赋能环境优化的政策支持、政府资金获取渠道、政府贴息力度、财政支持力度、软件和硬件的支持水平       |
|          | 金融信息平台建设 | 授信成本问题、部门间协调度不够、授信额度的依据、信息获取成本、授信方式的完善、信息的不对称程度            |

## (三) 选择性编码

经过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得到对应三个维度的6个主范畴。结合其他途径获取的文本资料,在扎根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文的基本故事线:数字金融在赋能乡村创业过程中,数字技术应用和更新为赋能基础,具体表现为数字化的便捷程度和可应用的场景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创业者个体的特征为赋能关键,具体表现为创业者素质和创业者的风险偏好的影响;政府的支持为赋能保障,具体表现为政策性支持和金融信息平台建设对赋能效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出了关于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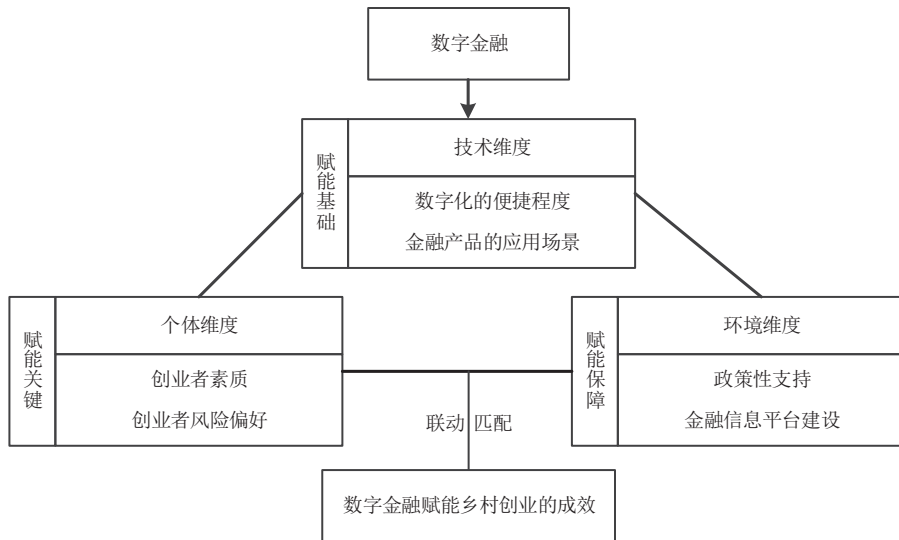


图2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模型

## (四) 数据检验

为了确保以上编码过程的可靠性,本文需要通过检验理论饱和度与信度,共同对编码后的数据进行校对。首先,对其余三段访谈资料(case 16、case 17、case 18)进行以上同样编码,并没有得到新的主题和维度,证明本文的编码已经达到理论饱和。在进行信度检验过程中,先邀请不参与本文但熟悉扎根理论的人员对扎根过程进行把握,指出编码过程中的问题。随后,本文作者各自进行单独选择性编码,对比后得出编码的一致性。经计算,不同编码者的一致程度达到0.8,属于可接受的水平(Gioia et al, 2013)。因此,可认为研究形成的主范畴理论饱和度和信度较好。

五、基于 fsQCA 的赋能路径分析

(一)变量确定及赋值

通过扎根理论获取了影响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主要因素,将其作为组态分析的条件变量。32 个乡村创业案例是团队在调研中获取的,因分属不同的乡镇和领域,难以确定统一的参考标准。因此,本文根据客观情况及直接询问的方式对调研的案例进行判定,基于四分法对条件变量赋值。而结果变量选取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的成效,因为案例的成效一般分为高低,可进行二元划分。变量的赋值见表 4。

表 4 案例变量赋值

| 变量类型 | 细分变量              | 变量赋值                                                                    |
|------|-------------------|-------------------------------------------------------------------------|
| 条件变量 | 数字化便捷程度(CD)       | 数字化便捷程度极低时,赋值为 0;便捷程度较低时,赋值为 0.33;便捷程度较高时,赋值为 0.67;便捷程度极高时,赋值为 1        |
|      | 应用场景拓展(ES)        | 应用场景拓展极窄时,赋值为 0;应用场景拓展较窄时,赋值为 0.33;应用场景拓展较宽时,赋值为 0.67;应用场景拓展极宽时,赋值为 1   |
|      | 创业者素质(EQ)         | 创业者素质极低时,赋值为 0;创业者素质较低时,赋值为 0.33;创业者素质较高时,赋值为 0.67;创业者素质极高时,赋值为 1       |
|      | 创业者风险偏好(RA)       | 创业者风险偏好极低时,赋值为 0;风险偏好较低时,赋值为 0.33 风险偏好较高时,赋值为 0.67;风险偏好极高时,赋值为 1        |
|      | 政策支持(PS)          | 政策支持力度极小时,赋值为 0;支持力度较小时,赋值为 0.33;支持力度较大时,赋值为 0.67;支持力度极大时,赋值为 1         |
|      | 金融信息平台建设(PC)      | 金融信息平台建设极不完备时,赋值为 0;平台建设较不完备时,赋值为 0.33;平台建设较完备时,赋值为 0.67;平台建设极完备时,赋值为 1 |
| 结果变量 | 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的成效(DE) | 赋能成效不显著时,赋值为 0,赋能成效显著时,赋值为 1                                            |

(二)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对组态条件进行分析前,为了检验单一因素是否是影响赋能成效的必要条件,需要对各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一致性反映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重要性程度,覆盖率反映一致性超集的经验相关性。通过一致性指标可以判断条件变量的必要性,若一致性大于 0.9,则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利用 fsQCA3.0 软件得出数字金融的高/低赋能成效的必要条件。从表 5 以看出,所有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 0.9,表明不存在影响赋能成效的必要条件。

表 5 各条件变量的必要性检验

| 条件变量          | 一致性    | 覆盖率    | 条件变量          | 一致性    | 覆盖率    |
|---------------|--------|--------|---------------|--------|--------|
| 数字化便捷程度(CD)   | 0.7187 | 0.8072 | 创业者风险偏好(RA)   | 0.4920 | 0.6917 |
| 非数字化便捷程度(~CD) | 0.3374 | 0.4111 | 非创业者风险偏好(~RA) | 0.5882 | 0.5882 |
| 应用场景拓展(ES)    | 0.5711 | 0.7645 | 政策支持(PS)      | 0.8262 | 0.6913 |
| 非应用场景拓展(~ES)  | 0.4957 | 0.5141 | 非政策支持(~PS)    | 0.2246 | 0.4352 |
| 创业者素质(EQ)     | 0.6861 | 0.6992 | 金融信息平台建设(PC)  | 0.5508 | 0.8142 |
| 非创业者素质(~EQ)   | 0.3647 | 0.4996 | 金融信息平台建设(~PC) | 0.5160 | 0.4987 |

注:~表示变量集合的非集,如~数字化便捷程度表示非数字化便捷程度。

(三)组态分析

遵循已有研究判别标准与观测样本的情况,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8,频数阈值设置为 1 (Fiss, 2011; Franzoni 和 Sauermann, 2014)。通过 fsaQCA3.0 软件进行充分性分析:标准化运行后,得出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并对中间解和简约解进行布尔代数运算,得出组态结果见表 6,即得到 3 条数字金融高赋能成效的驱动组态和 2 条低赋能成效组态。其中在简约解又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的条件为辅助性条件。

根据表 5 可得,该组态解集由 6 个组态条件和 5 条路经组成,其中高赋能成效组态解有 3 种,

表 6 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路径

| 条件变量  |              | 高赋能成效组态解 |        |        | 低赋能成效组态解 |        |
|-------|--------------|----------|--------|--------|----------|--------|
|       |              | 1        | 2      | 3      | 1        | 2      |
| 技术维度  | 数字化便捷程度(CD)  | ■        |        | ■      |          | ■      |
|       | 应用场景拓展(ES)   | ●        |        |        | □        |        |
| 个体维度  | 创业者素质(EQ)    | ●        | ■      | ●      | □        | □      |
|       | 创业者风险偏好(RA)  |          | ■      | □      | □        |        |
| 环境维度  | 政策支持(PS)     |          | ●      |        | ⊗        | ⊗      |
|       | 金融信息平台建设(PC) | ●        |        | ●      |          | □      |
|       | 一致性          | 0.8548   | 0.8898 | 0.8412 | 0.9231   | 0.9329 |
|       | 覆盖度          | 0.4406   | 0.3626 | 0.2380 | 0.4008   | 0.4511 |
|       | 总体一致性        | 0.8180   |        |        | 0.9549   |        |
| 总体覆盖度 |              | 0.5385   |        |        | 1.0000   |        |

注:●代表核心条件出现;⊗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缺失;空白代表该条件可存在亦可缺席。



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180,大于一致性的可接受范围0.8,总体覆盖度为0.5385,表示该组态解可以解释近53.85%高赋能成效出现的原因。低融合水平组态解有2种,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549,大于一致性的可接受范围,总体覆盖度为1,该组态解可以解释所有低赋能成效出现的原因。此外,各组态对应的一致率均大于0.8的阈值,以上条件组态一致性水平较高,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较强,基于此,上述总共3组的高赋能成效组态可视为数字金融赋能下,乡村创业取得显著成效的充分条件组合,总共2组的低赋能成效组态可视为数字金融赋能下,乡村创业成效不显著的充分条件组合。

#### (四) 结果与讨论

根据表5产生高赋能成效的总共3组的条件组态,对比前因变量发现,组态1中,各维度的条件变量都存在,影响高赋能成效的条件较为均衡。因此将其命名为全面均衡的赋能成效影响路径。组态2尽管也受到三个维度的影响,但核心条件存在于环境维度。因此可以命名为环境拉动型影响路径。组态3核心条件存在于个体和环境维度,可以命名为个体能动+环境拉动型影响路径。三种类型的赋能成效影响路径分析如下:

(1)全面均衡型。组态1中,组态结果为:数字化便捷程度 $\times$ 应用场景拓展 $\times$ 创业者素质 $\times$ 金融信息平台建设( $CD \times ES \times EQ \times PC$ ),其中应用场景拓展、创业者素质、金融信息平台建设为核心条件。该路径表明,无论创业者风险偏好及政策性支持力度如何,当创业者素质较高,数字金融应用场景广泛,数字化便捷程度同时较高,且金融信息平台建设较完善时,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的赋能成效显著。因此,数字金融的赋能成效受上述多个因素影响。首先数字金融产品的安全可靠性能很大程度影响创业者的使用频率。其次创业者对数字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是赋能的关键,如果无法熟练应用支付宝、网上银行等软件,其赋能成效将大打折扣。最后,数字金融的开展需要依托金融信息平台的建设,这不仅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授信成本,还决定了转嫁给创业者的金融使用成本,最终会影响到赋能的成效。由此,三个维度兼顾的路径,要更加关注各维度因素间的协调平衡,这是数字金融赋能下,乡村创业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方式。

(2)环境拉动型。组态2中,组态结果为:创业者素质 $\times$ 创业者风险偏好 $\times$ 政策性支持( $EQ \times RA \times PS$ ),其中政策性支持为核心条件。该路径表明,要取得高赋能成效,要注重赋能环境的建设,重点突出政策性支持对赋能过程的影响。赋能环境持续优化将成为有效赋能的保障和前提,政策性支持为数字金融的高效赋能提供了持续动力,直接影响到最终的赋能结果。此外,创业者素质也成为该路径中的重要因素,影响着赋能成效。但此路径中充分发挥政策性支持的作用,是取得高赋能成效的根源性保障,也是提升赋能成效的重要方式。政策性支持能强化我国制度优势,兼顾公平与效率,数字赋能环境的建设投入大,收益慢,且资本具有逐利性,数字环境的优化必然依赖于政府。政策性支持有利于引导赋能方式向更有效的方向转变,比如专项财政支持可以降低创业者使用数字金融的成本,加快数字金融产品的拓展速度。

(3)个体能动+环境拉动型。组态3中,组态结果为:数字化便捷程度 $\times$ 创业者素质 $\times$ 金融信息平台建设( $CD \times EQ \times PC$ ),其中创业者素质、金融信息平台建设为核心条件。当数字化便捷程度、创业者素质较高,以及金融信息平台建设较完备时,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的赋能可以取得显著成效。该路径中,如何提升创业者素质及金融信息平台建设速度是赋能过程的核心问题,更是提升赋能效果的中心环节。创业者素质高低决定了数字金融产品的推广,帮助创业者了解、使用金融产品是推动赋能进程的关键性途径。具备金融知识的创业者能够频繁、熟练的运用数字金融,有助于发挥资金要素对创业活动的帮助。

此外,还存在2条低赋能成效组态,通过分析发现,低赋能成效与产生高赋能成效的组态相比,呈现出因果的非对称性特征。低赋能成效路径的总体一致性为0.9549,大于0.8的阈值。基于此,可以得出多个条件变量的缺失,是造成低赋能成效的主要原因,其中核心变量的缺失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当应用场景拓展不够、创业者素质较低、创业者风险偏好不高、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时,数字金融的赋能过程会受到技术、个体和环境维度下多个因素的影响,对乡村创业的赋能处于低水平状态。此外,从另外一个低赋能成效组态中可知,无论其他条件如何,只要数字化便捷程度不高、创业者素质较低、政策性支持不够、金融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时,其赋能结果必然是低效的。以上两条路径意味着:技术、个体和环境三个维度条件变量的缺失,会导致低赋能成效,其中政策性支持这一核心条件的缺失对结果起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 (五) 稳健性检验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参数设定与模型设定带来的威胁很可能造成结果的随机性和敏感性(Krogslund

et al, 2015)。因此本文对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借鉴已有成果,通过调整一致性水平与改变部分变量的校准区间进行稳健性检验(赵云辉等,2020)。在上述条件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条件组态仍然在结果解释上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就认为结果是稳健的。

首先,调整一致性门槛值,采用0.85的阈值替代0.8,虽然得出的路径与先前有微小变化,主要体现在某些边缘条件上,但组态背后的解释机制是不变的,调整一致性后,本文的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次,本文采用新的校准区间对数据进行校准,总体的一致性和覆盖率仅产生细微变化,形成的路径数保持稳定。因此,通过上述对一致性和校准区间的调整,证明本文具备较好的稳健性。

##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基于团队调研收集的访谈资料,结合二手资料等,运用扎根理论凝练出对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的成效产生影响的因素,构建赋能成效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出影响赋能成效的多元条件变量组合,解释了多个可能的影响因素与高赋能成效之间的复杂因果作用机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技术、个体和环境三个维度的条件“多重并发”,形成了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多样化影响路径,组合不同但导致了相同结果。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的赋能效果受技术、个体和环境三个维度共同影响,缺一不可。任何一个因素既不能构成影响赋能成效的必要条件,又不能成为充分条件。赋能成效的组态结果表明,存在3条高赋能成效路径,即全面均衡型、环境拉动型、个体能动+环境拉动型3条等效路径,并且能够较为显著体现出“殊途同归”特点。此外,还存在2条导致低赋能成效的路径,相较于高赋能成效呈现出因果非对称特征,反映出不同核心条件缺失对赋能成效的重要影响,同时也验证了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的高赋能成效组态与低赋能成效组态的非对称性,打破了高低对称的传统二元论。因此,本文为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丰富解释,弥补了当前研究较为片面的不足。

(2)实现高赋能成效的3条路径呈现出异质性的特征,路径的差异在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尽管调研区域选取在苏南地区,但是每个乡镇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发展水平一般的乡镇,需要依靠应用场景拓展、创业者素质提高与金融信息平台建设,辅之以数字化便捷程度的提升,实现高赋能的成效,此路径属于全面均衡型。而发展较快的工业镇,经济实力较强,采取环境拉动型路径,依靠地方财政给予大量政策性支持,再通过提升当地创业者的素质,实现高赋能成效。个体能动+环境拉动型的路径则适用于经济实力不强的农业镇,因为数字化进程推进成本高,速度慢,首要任务是通过提升创业者对数字金融的接受程度,增加创业活跃度。因此通过提升创业者个体素质与政策性的支持,是取得高赋能成效的有效路径。综上所述,在实现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的高赋能成效过程中,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可采取的路径也有所差异。因此需要结合不同地区发展特点,因地制宜,找到适合本地区高成效的赋能路径。

(3)通过对实现高赋能成效3条路径的比较,发现应用场景拓展、创业者素质、政策性支持、金融信息平台建设是驱动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的重要牵引力,对最后的赋能成效起到决定性作用,拓展了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的理论视角。另外,还需要注意导致低赋能成效的2条路径,其中政策性的支持作为这2条路径的核心条件,其存在不能直接导致高赋能成效的出现,但其缺失必然导致低赋能成效的产生。除此之外,最终的赋能成效不仅由数字金融产品本身决定,同时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环境的拉动作用,在协同作用下,才能形成合力实现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的高赋能成效。与以往对单一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赋能成效不仅受到自身技术维度的影响,而且个体维度作为赋能关键,环境维度作为赋能保障,都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对影响赋能成效的核心和边缘条件进行区分,为理解数字金融赋能成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 (二)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业态相结合的新一代金融服务,对其赋能创业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而创业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数字金融赋能的成效受到多因素影响。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得出多个影响因素,运用组态分析法探究了各因素组合与赋能成效间的作用关系,做出以下理论贡献:首先,本文打破现有研究局限,对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及路径进行探索,基于QCA集合论的视角,从技



术、个体和环境三个维度提炼6个关键因素,并提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模型,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其次,本文将扎根理论与定性比较法引入数字金融赋能的领域,在缺乏成熟理论框架时,能够深度剖析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赋能的现实,并以此为依据提出3条导致高赋能成效的路径与2条导致低赋能成效的路径,验证了高赋能成效与低赋能成效影响路径的非对称关系,研究结果准确揭示了各影响因素与赋能成效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拓展了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范畴,为未来研究提供思路。最后,本文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启示,3条导致高赋能结果的路径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发挥数字金融赋能作用的条件和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的发展路径,提高数字金融赋能成效。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强有力的政策引导,还需要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不断增强数字金融的服务水平,创业者主动学习金融机制,发挥自身能动性,才能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赋能作用。本文从三个主体出发得出如下管理启示:政府部门因地制宜选择合适路径,发挥支撑作用。政府应不断改进和完善乡村范围内的金融实施政策,加强金融信息平台建设,引导多个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加大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降低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过程中金融机构信息成本与承担的高额违约风险,真正意义上实现互利共赢,为数字金融赋能提供良好环境;金融机构积极拓展数字金融的服务覆盖面,开发新的应用场景,引导乡村新业态新产业的衍生。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依托现有数字金融的服务模式,满足创业者生产型、消费性、收益性金融需求。此外,产业振兴离不开新业态新产业的衍生。因此;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利用新技术开发新的数字金融服务模式,引导并激发创业者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引领产业发展新方向;创业者提升自身素养,勇于尝试新事物,发挥其在数字技术赋能的关键性作用。创业者可以通过参加金融机构政策宣讲会,或者网络学习,有意识地提升自身金融知识积累,实现个体维度对数字金融赋能成效的影响,形成自身需求与数字金融服务的精准匹配。

### (三)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文从整体多维角度出发弥补了先前研究的不足,但某些方面未来可做进一步深化。首先,本文调研的区域是适宜开展数字金融研究的苏南地区,未来随着数字乡村的建设,金融服务的升级,可以将研究区域拓展到更大范围进行探讨,可能会发现更多维度的影响因素,形成更为丰富的赋能成效影响路径;另外,本文中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互补替代关系,导致各组态条件间的复杂内在联系。因此,对各条件变量间互补替代关系的探究是未来探索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1] 蔡莉,杨亚倩,卢珊,等,2019.数字技术对创业活动影响研究回顾与展望[J].科学学研究,37(10):1816-1824,1835.
- [2] 常凌翀,2021.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民数字化素养的价值内涵与提升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6):114-119.
- [3] 陈晓芬,杨朝军,2017.基于长尾理论的共享金融发展策略研究[J].管理现代化,37(3):5-7.
- [4] 杜运周,贾良定,2017.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33(6):155-167.
- [5] 高锡荣,王兴蓉,2020.信息空间视域下用户创新的智能化赋能机制研究[J].技术经济,39(12):89-99.
- [6] 国胜铁,姚育成,2021.新时代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经济纵横,(4):95-102.
- [7] 何广文,刘甜,2019.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创业的金融支持研究[J].改革,(9):73-82.
- [8] 黄季焜,2018.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J].农业技术经济,(3):4-15.
- [9] 黄益平,黄卓,2018.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17(4):1489-1502.
- [10] 兰永海,温铁军,2018.存差条件下的县域金融恶性竞争及其风险性质转化[J].农村金融研究,(3):58-61.
- [11] 李德山,赵云佳,苟晨阳,2021.普惠金融对不同群体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调查数据[J].技术经济,40(8):97-106.
- [12] 林虹,林志明,池仁勇,2021.海归创业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组态与提升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J].技术经济,40(9):102-111.
- [13] 宋帅,李梦,2021.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5):38-49.
- [14] 苏皓,康鹏胜,邓文博,等,2021.复杂情景下创业机会识别的路径与效果——基于定性比较分析(QCA)的研究[J].技术经济,40(5):124-132.
- [15] 苏岚岚,彭艳玲,2021.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3):27-40.
- [16] 苏岚岚,张航宇,彭艳玲,2021.农民数字素养驱动数字乡村发展的机理研究[J].电子政务,(10):42-56.
- [17] 田杰,谭秋云,靳景玉,2021.数字金融能否改善资源错配?[J].财经论丛,(4):49-60.
- [18] 王丹,李柏洲,2021.企业原始创新失败形成机制研究——基于25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J].软科学,35

- (4): 34-42.
- [19] 温涛, 陈一明, 2020.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 实践模式、现实障碍与突破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7): 118-129.
- [20] 温涛, 何茜, 2020.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历史方位与现实选择[J]. 财经问题研究, (5): 3-12.
- [21] 雍旻, 刘伟, 邓睿, 2021. 跨越非正式与正式市场间的制度鸿沟——创业支持系统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作用机制研究[J]. 管理世界, 37(4): 112-130.
- [22] 曾之明, 余长龙, 张琦, 等, 2018.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民工创业机制的实证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34(12): 58-65.
- [23] 张林, 温涛, 2021. 农村金融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与破解路径[J]. 现代经济探讨, (5): 110-117.
- [24] 张龙耀, 李超伟, 王睿, 2021. 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来自四省农户调查的微观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5): 83-101.
- [25] 赵云辉, 陶克涛, 李亚慧, 等, 2020.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 QCA 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11): 118-136.
- [26] 郑雁玲, 田宇, 202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创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 宏观经济管理, (7): 58-64.
- [27] 庄晋财, 尹金承, 庄子悦, 2019.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创业的演变轨迹及未来展望[J]. 农业经济问题, (7): 83-92.
- [28] STRAUSS A, CORBIN J, 2015. 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M]. 朱光明, 译. 第 3 版.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29] FISS P C, 2011.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2): 393-420.
- [30] FRANZONI C, SAUERMAN H, 2014. Crowd science: 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open collaborative projects[J]. Re-searchPolicy, 43(1): 1-20.
- [31] GIOIA D A, CORLEY K G, HAMILTON A L, 2013. Seeking qualitative rigor in inductive research: Notes on the gioia methodology[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6(1): 15-31.
- [32] KROGSLUND C, CHOI D D, POERTNER M, 2015. Fuzzy sets on shaky ground: Parameter sensitivity and confirmation bias in fsQCA[J]. Political Analysis, 23(1): 21-41.
- [33] MAJCHRZAK A, JARVENPAA S L, HOLLINGSHEAD A B, 2007. Coordinating expertise among emergent groups responding to disasters[J]. Organization Science, 18(1): 118-127.
- [34] STIGLITZ J E, WEISS A,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3): 393-410.
- [35] STRAUSS A, CORBIN J, 1994.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J].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7: 273-285.

##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Digital Finance Empowering Rural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32 Cases

Lu Shen<sup>1</sup>, Zhuang Jincai<sup>2</sup>

(1. 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Jiangsu, China;

2. Institute of New Rural Develop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digital finance's influencing factors enabled the path an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ffectiveness to achieve high enabling effectiveness, the grounded theory was used to condense digital finance's influencing factors enable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ffectivenes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at is enable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ffectiveness was constructed. On this basis, us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digital finance's different conditions were explored by this paper for rural entrepreneurship to achieve high enabling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echnology's dimensions,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there are six factors that affect empowerment's effectiveness: the convenience of digitization, applicable scenes,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 risk preference of entrepreneurs, policy suppor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platform. Under six factors' different combination, three paths to achieve high empowerment results have been formed, namely: comprehensive balanced path, environment driven path and individual initiative + environment driven path.

**Keywords:** digital finance; rural entrepreneurship; grounded theory; influencing factor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